

## 八、從方法論立場論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自中西史學傳統發展之經驗觀之，不僅人類歷史意識之發達與時代之變化相表裏，歷史學整體之進展亦與世變相推移。史學研究固受時代之刺激而得以拓展其視野，通貫其脈絡；然史學之智慧亦轉而批導其時代，針砭時代之沈疴。職是，史學與時代之間動態之辯證性關係乃使古今不截然斷爲兩橛，而千年如會於一堂也。就古代史學發展之事實言之，春秋晚委，周道衰廢，「王者之迹息」，世變日亟，於是乃有「春秋」之撰作①，此時代對史學研究之刺激也；然史學家亦欲通過史著以提昇時代，以「春秋」一書完成其「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理想②。古希臘史家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 ?460-400B.C.）目睹公元前第五世紀雅典與斯巴達之內訌，身預歷時卅載波及希臘各邦之帕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B.C.），乃有所感動於心，撰述「帕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垂諸久遠以爲教訓。

近代以來，史學研究尤與世變桴鼓相應，交光互影。十九世紀歐西史學界樂觀氣氛之所以大為瀰漫，史學家對「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信持之所以若是其誠篤，遠之固自西洋思想傳統中源遠流長之「進步觀念」汲取其泉源❸，近之則與十九世紀以降科學主義之時代背景相表裏也。洎乎二十世紀，則學風漸變，一方面歷史主義（Historism）所引起的危機諸如歷史相對性之問題、史學方法之間題及國家與權力使用之間題等逐漸暴露，史學家特羅慈（Ernst Troeltsch, 1865-192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及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已開始反省歷史主義之間題及其內蘊之危機❹。然對十九世紀以降歐陸歷史主義之史學傳統最具摧毀力之因素仍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局之變化。戰爭期間，人類史上所見最殘酷之屠殺一再重現，納粹在歐洲各地肆行殺戮，猶太人集體慘死於瓦斯毒氣室，日本軍閥殘殺中國同胞，毀滅性的原子彈初次投擲於廣島及長崎，凡此種種皆刺激史家反省歷史主義傳統中所蘊涵之價值多元觀，方法論之主觀性及國家權力之濫用等問題。此種時代變局之背景，係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與柏林（Isaiah Berlin）爭辯歷史研究中道德判斷問題之現實原因，亦為柏林教授力持歷史研究必談價值，捨價值無史學之根本理由❺。

在此種世局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史學研究之風氣亦為之丕變。吾人細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近三十年來歐美史學研究大勢似不出以下二大趨勢：一是【定論歷史】（Ultimate History）信念之揚糜：十九世紀史家意氣昂揚，充滿自信，顧盼自雄，深信史料一旦蒐集齊全即可舉起如椽巨筆寫下定

論之歷史，法國著名史家古朗士(N. D.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的名言。「不是我在寫歷史，而是史料通過我在陳述它而已」，英國史家伯利(J. B. Bury, 1861-1927)所謂「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science, no more and no less")，皆為此種樂觀信心之反映。然人類歷經二次大戰之浩劫之後，此種「科學史學」之信念乃為之動搖，戰後歐美史家一面承三〇年代歷史相對論者不滿科學史學之餘緒，一面又在變幻世局的打擊之下哀聲悲嘆，展望前景一片蒼茫。最能反映戰前及戰後此種物換星移之轉變者殆為英國所出版「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及「新劍橋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編者所撰之編輯旨趣書。「劍橋近代史」於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編輯出版，由著名史學家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主持編輯事宜。艾克頓師事德國史學家杜靈傑(Ignaz Döllinger)七年之久，把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界注重第一手史料之研究方法引入英國，並開始把英美及歐陸之歷史發展視為一不可分之整體，在歐洲史學史上有其不可磨滅之地位。艾氏承十九世紀科學史學之餘緒，深信「定論歷史」之可能性，艾氏在其以「劍橋近代史」總編輯身份致各論文撰寫人之信函(“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即申明此一信念❸。而最足以體顯其史學思想者殆為以下一段演講辭：❹

在幾年之內，所有的這些著作都將定稿，而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也就昭然若揭了。……。  
「劍橋近代史」即為此一樂觀信念下之產物。然此種樂觀之意氣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浩劫而消逝殆盡

。一九五七年，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主持「新劍橋近代史」的編輯計劃，即宣稱：<sup>⑨</sup>

後世的史學家……將會預期他們的著作必須一代代地被超越。他們認為，我們關於過去的知識是經由一個或幾個人的心靈所承下來的，也經由人的心靈加以過濾，因此，（歷史知識）並沒有包含絕不可易的基本因素或非個人的因素。……因為一切的歷史判斷都含有個人因素及觀點，不相上下，所以並沒有「客觀的」歷史真理。

克拉克此語較之艾克頓之言可謂相去不啻萬里，其間之差異最可透露戰後歐陸史學研究之轉向也。<sup>⑩</sup>

戰後史家對「定論歷史」信念之拋棄不僅以歐陸史學界為然，亞洲之日本史學界亦有類似之發展。論者嘗指出，戰後日本史學研究之最大特徵乃在於對「實證主義史學」傳統之批判，此種批判潮流與史家對天皇體制之批評相伴而行，代表戰後日本史學界之反省。<sup>⑪</sup>我國史學界近年來對於近代中國史學追求科學化之兩大途徑——「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反省亦與戰後世界一般動態相呼應。<sup>⑫</sup>

戰後世界史學研究的第二個大趨勢是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之交互影響之程度與日俱增，而全世界社會政治秩序的重整與自由傳統的備受挑戰都使史學家努力於尋求新的治史觀念與史學方法。另一方面，德國歷史主義的沒落也使更多史學家注意到政治史以外諸如經濟、社會、文化、思想乃至心理的層次。這種戰後史學要求擴大其研究領域的動向就促成了近三十年來史學與社會科學兩者間的密切合作，尤以美國史學界為然。美國思想中原有一種實驗主義之傳統，此表現而

爲以史學爲政治改革工具之信念。戰後史學與社會科學之結合更在史學界引起了一場寇克蘭(Thomas C. Cochran, 1902—)所謂之「內在革命」(Inner revolution)，洵至經濟史幾已獨立於一般史學研究範圍之外，而未受社會學訓練之史家亦不敢輕言社會史矣。

歐陸之史學則可以〔九五五年〕爲其分水嶺。自是年起，所謂「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其學報創刊於一九二九年)之史學透過白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等人之領導開始對史學研究產生可觀的影響⑫。在此種研究領域的拓展之下，史學研究的重點從以前注重個人逐漸轉移到社會，而研究方法也從以前的注重定性分析逐漸轉而講求定量分析。

在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戰後研究趨勢之中，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是吾人極應重視的一環。誠如英國史學家厄爾頓(G.R. Elton) 所云，社會學敎導史學家對舊史料及舊史實提出新問題⑬，近三十年來社會學對歐美史學界造成重大之衝擊，其餘波流風所及，中國史學家深深感受到社會科學對史學之挑戰。舉例言之，吾國史學界前輩張蔭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一、十、廿四)即嘗與友人論志趣云：「國史爲弟志業，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無非爲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⑭，張氏冀求會通史學與社會學之心願躍然紙上。弁潤孫亦云：「我國今後史學發展，必當以社會科學爲基礎，始克躋諸世界史學之林」⑮，其言頗能反映吾國史學所受到的社會科學之壓力感。此種壓力感與時俱增，無日或已，張玉法教授近日嘗著文爲「史學將沒有生存的餘地」之現象而憂心忡忡云⑯：

各類科學都在無限擴張其範圍，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擴張，對史學的威脅極大，史學家如不振作，史學將有被瓜分的可能。有價值的史學著作將為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甚至統計學家，心理學家所寫的歷史，史學家將只是「東抄西湊」的人，而史學也就變成了雜  
論。

此類言論皆涉及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此為今日吾國史學界所面臨的一項重大問題，亟待吾人深思。

## —

中國知識界之知有社會科學當在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之時，然其知之也漸，非一蹴而躋。據近人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界共翻譯西洋書籍五六七種，其中百分之四十屬於自然科學領域，屬社會科學者僅佔百分之八<sup>17</sup>。(中國知識界真正開始正視社會科學之重要性當自甲午之戰（一八九五年）以後，甲午之役日本以蕞爾小島一舉擊敗大清帝國，此一刺激使中國知識份子心神之所關注從堅船利礮轉向政法制度，康梁變法於焉出現，而社會法政諸學亦一併而獲國人之注意。一八九八年，嚴復（又陵，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始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之 *A Study of Sociology*（1883）為中文，顏之曰：「羣學肆言」，越四年，全書竣事，嚴幾道譯此書有其以天演原則證釋社會進化原理之用心<sup>18</sup>，此為中國學界正式譯介西方之社會學。

近代吾國史學界對歷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反省當自梁啟超（一八七六—一九二九）始。清光緒二

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任公發表《新史學》乙文，此文極可反映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新史學啓蒙時期中國人不滿傳統史學之一般情緒。此年亦爲任公流亡日本之第三年，開始公開放棄前此所持立孔教以爲國教之主張，並力倡新民之說，主張重公德而求羣體之利益。在此種思想背景之下，任公回顧傳統中國史學，乃激憤不滿之情流露於筆端。任公一面欣羨於「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文明所以日進，史學之功居其半焉」<sup>⑯</sup>一面則指出傳統中國史學知識未能普及於國民之四大病源：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個人而不知有羣體；三曰知有陳述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繼又指出中國史學緣此四蔽後生二病：一曰能鋪敍而不能別裁；二曰能因襲而不能創作。<sup>⑰</sup>職是，任公乃一如其欲一新國民之德行而提出新民說，在此提出「新史學」之主張，並以「新史氏」自命。任公爲新史學所下之定義有三：（一）歷史者敍述進化之現象也；（二）歷史者敍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三）歷史者敍述人羣之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sup>⑱</sup>任公又爲新史學下一總定義云：「歷史者何？敍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曰，舍人種則無歷史。」<sup>⑲</sup>任公對歷史所下之定義佔有極其濃厚的達爾文（C.R. Darwin, 1809-1882）進化論之色彩，此種歷史進化論乃西方近代史學之首先輸入中國者<sup>⑳</sup>，任公生逢其會，其言論乃不知不覺受進化論之影響也。任公所倡《新史學》之言論中實已蘊涵有社會學之眼光，頗能開風氣之先。

任公之後，介紹社會學入中國史學界者當推何炳松。在何氏之前，劉師培（申叔，一八八四、五

（一九一九、十一、廿）嘗撰文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sup>◎</sup>然影響似不深遠。就學術史立場言，何氏是近代中國史學界中輸入西洋治史方法之一重要人物。彼於民國九年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歷史研究法」一課，此或為國內大學設置此一課程之為時最早者。何氏嘗於民國十年譯美國史家魯賓孫（J. H. Robinson, 1863-1936）之《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書為中文，此為吾國史學界所譯有關西洋史學理論及方法論之第一部著作，歷史意義至為重大。中國史學界之注重史學與社會科學關係受此書影響甚大。何氏雖倡魯賓孫之「新史學」，然其在社會學與史學之關係一節多側重其相異面。何氏之言曰<sup>㉙</sup>：

至於史學與社會學雖同以已往之人羣事跡，為研究之根據；然目的方法，既然各不相同，研究結果，亦復迥然有別。史家抉擇事實，旨在求異。所取方法，重在溯源。其結果非人類共同演化之原理，乃人類複雜演化之渾淪。至於社會學所致意者乃已往人羣事跡之相同。參互推求，藉以發見駕馭人羣活動之通則。選擇事實，務求其同，不求其異。所得結果，非人類演化之渾淪，乃人羣活動之定律。故社會學為研究社會之自然科學，其所取方法，與史學異，而與自然科學同。總之，史學所重者在質，社會學所重者在量。史學所求者為往跡之異，社會學所求者為往跡之同。兩者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分明，不能相混。此學者所宜明辨者也。

何氏這一段言論頗能代表民國以來吾國史學界一部份人士對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看法，故請自何氏所云此兩種學科之差異點說起。

通說以爲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差大異不外以下二節：一是史學研究所注重者在於人類活動之發展順序及其過程，而社會學研究則探討人類活動發展之型態及其轉變。前者重其縱剖面的連續，其關心之焦點在事件之「變」與「常」；後者重橫切面之比較，其關心之焦點在事件之「類」與「型」。此其一。二是史學研究冀圖釐清人類行爲之因果關係。故其重點在〔過去〕、在〔個案分析〕；而社會學研究則企圖建立人類行爲之普遍模式，故其重點在〔現在〕、在〔通則之建立〕。前者之特殊關切在〔特殊性〕，後者之特殊關切在〔普遍性〕。以上二種關於史學與社會學之差異的說法均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吾人細繹其說，思考史學與社會學之異同，則覽兩者間之歧異者其細節，兩者間之同調者其大經大脈。蓋因史學研究雖重事件之順序及其過程，但對事件之型態及其轉變並非絕不措意。十九世紀初年主持柏林大學的德國大哲洪保德（Wilhelm v. Humboldt, 1767-1825）在一篇著名的「論歷史家的責任」（“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的文字中嘗云：

如果歷史家僅照外面所表現地，一件一件地，將各事件的特殊情況予以描寫；如果歷史家不能把事件的內部聯繫給自己精密地解釋出來，不能創出自己對於活動力量的見解，不能正確地認識那些力量在某一定瞬間所取的定向，不能將見解方向二者聯合以與同時的情況以及過去的種種變化下一番的探究；那麼歷史家只好像素描家似的產生一些漫畫之類的東西罷了。

洪氏在哲學上之唯心論傾向吾人在此可存而不論，然洪氏上文之見解與吾國史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理想並無二致。太史公寫伯夷列傳，敍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

食之」<sup>27</sup>的行為過程，但太史公也關切這個事件在人類行為型態中所代表的普遍意義，所以他才會接著討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可信性這個問題。自「史記」以降，中國傳統史學中歷代正史的作者以叢傳的方式把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佞倖、外戚、帝王、武將、姦臣……等各種歷史人物分類敘述，這是一種具體的對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類型所作的探討。雖然以今日社會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分類在類型學 (typology) 上也許尚嫌粗疏，但是這也足以說明史學研究不僅重視人與事發展過程中的〔變〕與〔常〕，也有心於探討人與事演變過程中的〔類〕與〔型〕。這一點不僅見之於傳統中國史學，也見之於西洋史學。例如西元第二世紀傳記家普魯塔克 (Plutarch, Ca. 46?-126?) 著「對比傳記」<sup>28</sup>一書，敘述希臘羅馬史上所見之重要歷史人物，並取一位希臘史上之人物與一位行誼近似之羅馬史上之人物合而觀之，較其異同，如以費比亞斯·麥克西瑪斯 (Fabius Maximus) 比之於柏里克里斯 (Pericles, C. 495-429 B.C.)，以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384-322 B.C.) 比之於西塞羅 (Cicero, 106-43B.C.)，凡此皆係有一類型之觀念為之前導。由此可見，史學與社會學在類型研究上之差異僅可謂為程度上之差別而非性質上之重大不同也<sup>29</sup>。

其次，關於史學研究與社會學研究之差別在於特殊性之探討與普遍性之建立這種說法亦嫌言過其實。這種說法可以上溯到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亞氏在「詩學」一書中嘗云：<sup>30</sup>

歷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而詩人所描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故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莊

重；蓋詩所陳述者毋寧爲具有普遍性質者，而歷史所陳述者則爲特殊的。

亞里斯多德這種說法在今日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界仍屢見不鮮。吾人細按其實，這種說法其實忽略了史學研究從對事物的特殊性的探討到建立普遍性原則的動態過程。前舉太史公寫「伯夷列傳」之例足可說明此一事實。太史公希望透過對伯夷、叔齊此一「特殊」個案之反省而對人生價值信仰之困惑求得「[普遍]」之解決。希羅多德 (Herodotus, 484-429 B.C.) 寫「波希戰爭史」一書鋪敍波希戰爭 (西元前四九〇—四八〇) 此一「特殊」事件，然其最終目的乃在於建一己之歷史哲學，企圖在「特殊」事件與「普遍」知識之間建立一道永恆的橋樑。推而廣之，吾國史學傳統所見「左傳」之「君子曰」，《史記》之「太史公曰」，陳壽 (二二三—二九七)「三國志」之「評」，兩漢書之「論贊」，司馬光 (一〇一九—一〇八六)「資治通鑑」中之「臣光曰」，王船山 (一六一九—一六九二)「讀通鑑論」及《宋論》「中之史論」，<sup>31</sup>努力於從個別的人物或事物中歸納或抽離出普遍之原則，以追求整體性之歷史知識。

由上文之討論可知，史學或社會學皆以「人」爲其探討之對象，兩者之間有側重點之不同，而無根本性質之差異。至於兩者所探討之對象一爲「過去」一爲「現在」此種說法尤不值一駁。英國史學家崔微·魯波 (H. R. Trevor-Roper) 在一篇論述史學與社會學關係的講辭中即曾指出，「過去」與「現在」乃係不可分割之連續體，史學研究「過去」，社會研究「現在」，但是兩者實不分爲兩極。社會學家欲建立「模式」，最有效之辦法即將其「模式」與人類歷史所見之經驗相印。因此，魯氏大力鼓吹歷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sup>32</sup>。晚近歐美學界對於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持論頗爲一致，幾已成爲

人人共諭之義。如著名的美國經濟史大師寇克蘭 (Thomas C. Cochran, 1902—) 即指出傳統的敍述式史學作品有其限制，而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正是解決歷史的綜合這個問題的不二法門<sup>32</sup>。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 亦認為社會科學的基本發現，學術關懷及其學科的視野對史學研究均大有助益，有助於史學的敍述性作品及專論性作品在寫作方式上的突破<sup>33</sup>。

### III

上文之論述旨在指出史學與社會學在基本性質上之互通，以作為吾人思考此二種學科關係之張本。在吾人進一步分析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前，請先就學術史之立場回顧社會學此一學科近百年來之發展及其研究方法論之演變，以為下文討論之背景。

自十九世紀初年近代社會學成爲一個獨立學科以後，其所關懷之主要重點大致不出以下二項：一是對人類社會作巨視的社會學分析；二是對人類社會及文明作比較研究。由於此種巨視的研究傾向，近代社會學遂以以下三項問題爲主要的研究之焦點：一是關於社會及社會秩序的一般特徵之分析；二是對各種社會及制度型態作比較分析，尤其集中於研究近代社會之特殊性；三是對於人類社會之諸般不同型態從社會力量或機械論之立場給予解釋。針對以上這三大問題，近代社會學家採取何種研究途徑來進行研究並提出解釋？自學術立場，吾人可指出，其流派大勢之所趨不外以下之二途：一是早期的演化論的研究途徑 (Evolutionary Approach)。早期的社會學工作者均企圖透過對人類社會及文化

之比較及研究中指出其演化發展上之共同階段。此種研究傾向通貫孔德 (August Comte, 1798-1857)、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馬克斯 (Karl Marx, 1818-1883) 以及稍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如白勃浩 (Walter Bagehot, 1826-1877)、孫末楠 (W.G. Sumner, 1840-1910) 以及心理學派演化論者如華德 (L.F. Ward, 1841-1913) 等均顯然可見而成爲早期社會學理論之重大特徵。此下演化論的研究途徑漸爲學界所不滿，若干學者努力於把演化論的研究途徑與巨視的比較研究方法加以綜合，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即爲此一學風轉變時期之代表性人物。

一是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之比較研究途徑 (Comparative Approach)。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推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韋伯爲近代學界之通儒，其學術之領域極爲廣闊，不僅在中西歷史研究均有原創性之貢獻④，在社會學領域尤尤爲一代之宗師。韋伯採取比較研究之途徑，畢生追索二個大問題：一是，近代社會特質何在？換言之，近代社會與前代社會有何差異？二是，何以近代社會之特徵諸如資本主義、理性的官僚制度等等僅見於歐洲？近代歐洲社會所見之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官僚制度化 (bureaucratization) 及神話的解消 (demystification) 等發展趨勢是否爲人類社會之普遍現象或僅爲近代社會之特殊面貌？韋伯一生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均在不同角度之內與以上二大學術關懷互有關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韋伯所開創的此種比較研究途徑有再興之趨勢，然其所關懷之問題意識略有不同。一般說來，歐洲社會學界較重理論之拓展，美國社會學界則較重所謂「經驗性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irical research)，然戰後數十年間歐美社會學界似有一共同關懷之新問題，則即是：如何使所謂「未開發國家」成爲「已開發國家」？此一研究上的問題意識幾見於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如經濟學界之計量經濟學、政治學界之政治系統論，社會學界之人口學、區位學……等新興研究趨勢均著重於援用新方法及分析工具來探討此一大的時代問題。當代社會學大師埃森西塔(S.N. Eisenstadt)稱此一新的研究趨勢爲「系統研究途徑」(“*systemic*” approach)而推許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

、阿爾蒙(Cabrial Almond)及伊斯頓(David Easton)等爲代表人物<sup>35</sup>。此種所謂「系統研究途徑」即是把人類的社會或政治活動視爲一個自我完足之「系統」，認爲此一「系統」是一個實體，此一實體與其所自生之環境不同，自有其界限，亦自有其機構以維持其系統之持續性及自主性。

此種「系統研究途徑」與關於所謂「第三世界」之研究相結合，爲現代社會學提出了許多嶄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尤以「傳統社會」及「近代社會」之異同爲其主要關懷焦點。社會學家對於這類問題的探討，有了豐碩的成果，這就是一九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興起的所謂「發展社會學」<sup>36</sup>。發展社會學的新視野爲史學工作者提供了許多思考歷史問題的新方向，也對史學家提出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對於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刺激尤大，許多以西文撰寫的中國近代史論著均環繞「傳統——現代」這個主題即爲此種學術刺激最明確之說明。此類成果國內介紹甚多，人人耳熟能詳，吾人在此不再贅及。然則此種發展社會學之研究無論在意識型態上、在經驗上，乃至在方法論上均有值得商榷之處，而其尤爲嚴重之限制則集中於以下二端。一是缺乏歷史的眼光而且看問題多以歐洲爲中心，(ahistor-

;city and Europocentricity），無形中遂以歐洲近代發展之經驗作為人類社會之普遍模式；二是過份機械式地強調「傳統」與「現代」的二分觀念（tradition-modernity dichotomy），末流所及遂無形中以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為不相敵屬之敵體<sup>37</sup>。針對上述研究上的盲點，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漸有學者起而糾正。如埃森西塔所提出的「後期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觀念以及運用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的理論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官僚帝國<sup>38</sup>，皆係有見於此種研究途徑之間問題而欲起而矯正之也。

## 四

吾人上文對社會學發展所作冗長之介紹，一則在於釐清近百年來社會學術傳統所見研究方法之變遷，以作為吾人從事歷史思考之一助緣，使史學工作者自社會學的研究視野及研究方法中汲取靈感；二則在於透過對晚近社會學研究盲點的反省來恢宏史學工作者之胸襟，增益史學工作者之志氣。晚近史學工作同仁皆呼籲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鼓吹史學工作者勇於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然則，此非意味史學研究工作應淪為社會科學之婢女。事實上今日若干社會學作品缺乏歷史之深度久已成為人所詬病之事實，史學工作者對於社會學界此種缺陷最能有所貢獻。史學工作者在吸收社會學的豐富營養之同時，亦應有此種認識與抱負。

然則，史學與社會學之間存有若何之關係？一言以蔽之曰：共生之關係。因兩者間有共生之關係

在焉，故史學家與社會學家貴在相濟，不在獨申。此義可自以下二節反省：一是史學與社會學在方法論上具有互補的關係。本文第三節簡述社會學研究方法之進展，頗可見出早期社會學大師在研究方法上均傾向於演化的研究途徑，而此種演化的研究途徑與史學有密切之關係。吾人如謂早期社會學的發展在方法論上受益於史學研究之成果當不爲過。社會學大師涂爾幹研究人類社會時特重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此一觀點深受其巴黎高等師範的同學古朗士之啓發即爲一例。近十餘年來，「年鑑學派」的史學家在研究方法論上給予社會學家強有力之刺激，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及法蘭克 (A.G. Frank) 等人所謂「世界體系理論」深受「年鑑學派」所謂「整體歷史」(*l'histoire totale*) 觀點的啓發，更是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sup>⑩</sup>反之，社會學所發展出來的有關「社會流動性」、「參考團體」、「秀異份子」(Elites)……等研究方法對史學工作者啓示良多，則尤係人人共見之事實。就其學術淵源而言，吾人如謂古朗士對涂爾幹之啓發象徵史學對社會學之影響，則涂爾幹門下培養出中國史研究之著名學者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亦可代表社會學對史學之反哺。<sup>⑪</sup>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史學與社會學交互影響，轉相求益實已使雙方在研究方法上共蒙其利，日上層樓。

二是史學與社會學在問題意識的形成上互作辯證性之刺激。最足以說明此一層關係者殆爲韋伯及其後學所構成之學統。前文嘗云，韋伯畢生學問之關懷集中在二大問題之上：一是近代社會之特徵何在？二是何以此種特徵僅見於近代歐洲？韋伯一系列社會學論著均與此二大問題有關，而此二大問題之提出即是得力於韋伯所深具之歷史視野，其受惠於史學知識者爲獨多。然社會學家韋伯所提出的問

題意識卻轉而對此下探討歷史問題之學術工作者造成極其深刻之影響。吾人僅舉二位最為學界所習知之學者為例以概其餘。東京大學丸山眞男（一九一四—）探討德川時代（一六〇〇—一八六八）朱子學思維模式之解體及日本近代化之思想動因，即特別分析元祿以迄享保期間日本商人之缺乏所謂「資本主義精神」，視之為德川封建制度尚得維持不墜之一項原因。<sup>④</sup>此為韋伯所提之間題意識影響歷史學家之一例。再如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研究新儒學思想與中國政治文化，亦特別環繞韋伯有關儒家人性論之看法提出分析，<sup>⑤</sup>此為韋伯影響歷史研究之又一著例。

總結本節所論，史學與社會學在學術研究上之關係一如車之二輪，鳥之兩翼，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兩者不可分，亦不能分。

## 五

吾人提倡史學與社會學之合作，其目的乃在於求取兩者間動態之平衡與辯性之互動，而非淪史學為社會學之婢女也。<sup>⑥</sup>此一理想之提出乃係針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之經驗而發。彼時承北伐成功之後，史學界大量援引西人社會科學之理論或「模式」以解釋中國社會史，雖開風氣之先，然流弊所及，則史學及社會科學兩受其害。不僅社會學與史學無法結合，而且中國史之面目亦為之障

蔽。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先生對當時此種學風曾作如下之批判：

今之治史者，或爲無聊考據，或喜作膚淺理論，或襲取外人社會學說，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之類，以敍述吾之歷史，乃至援據所謂唯物史觀。如此等者，皆不會用心了解自家得失。根本缺乏獨立研究與實事求是之精神。

熊先生此段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肯綮，確值吾人深思。今日去北伐又已閱半世紀，吾人今日所提倡者乃史學與社會學之「有機」結合，而非「機械」之結合也。此所謂「有機」之結合就今日吾國之史學研究特具深刻之學術意義：

一：拓展傳統中國史學理想中之通識心胸。吾國史學原極注重「通」字，太史公史學原係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爲其鵠的，故其所撰「史記」廣被彼時人類整體之活動，故不僅修本紀，置列傳，亦述貨殖，敍遊俠，論大道。然此種通識胸襟自班固以下均不免狹隘化矣。孟堅之所關注在一朝一姓之興衰而不在人類整體之活動，宜乎其批評太史公若是其激烈也。中國史學中此種通識胸襟之狹隘化逮乎近代而益趨嚴重，一面受囿於乾嘉以降考據之學風，一面受囿於西洋歷史主義及科學史學之餘毒，民國以來之史學乃與太史公所揭橥之通識理想相去絕遠。社會學視野之加入中國史學研究當有助於通識心胸之開拓也。

二：司補史學家拙於論「常」之弊病。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經學與史學原不歧而爲二，此由「春秋」一書對中國史學著作所產生之深刻影響可知。經爲常道，史則論變，經史之結合使傳統史家知人

論世皆有所本。然洎乎近代，經學沒落，觸目所及，史家多論變而不知常，馳至以變爲歷史之常態，似以變爲人生之常態，落入價值相對論及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之陷阱而不自知，其事  
在爲可哀。針對晚近中國史學界經學沒著之特殊現象，社會學視野之加入當可促使史學工作者對社會  
之「常態」有所警覺，自有其學術上之意義也。

錢賓四（一八九五—）先生嘗拈出「世運興衰」「人物賢奸」八字以爲史家治史之矩矱，<sup>④</sup>認爲治史必自此八字入門，亦在此八字歸宿。傳統中國史學有其源遠流長之價值判斷傳統，故於人物之賢奸最爲關切。在紛紜之史事及人物之中，抉擗其幽隱，校計其毫釐，此爲傳統中國史家之能事。以下之史學研究當於「世運興衰」多作研討，而衡論世運，疏通知遠，則有賴於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也。  
(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九日完稿，本文原係拙編「史學方法論叢」一書之增訂再版代序，此書係民國七十  
年九月增訂再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 【附 註】

① 孟子（四部備要本），卷四，離婁下，頁一八，上半頁一九，下半頁。

② 史記（臺北：泰順書局影印新校標點本），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三二九七。

③ 參考：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關於這個問題，參考：李弘祺，「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現代西洋史學之危機」，史學評論，第一期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頁四一—七一。

- ⑤ 霍尼威氏之譯論，增收入..Hans Meyerhoff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9), pp. 228-272.

⑥ 見..Lord Acton, "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n his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H. McNeill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 396-399. 關於艾克頓對十八世紀及學術，參見..William H. McNeill 遺稿之導語。

⑦ 見..Lord Acton,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 p. 373.

- ⑧ 見..Sir George Clark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1970), pp. XXIV-XXXV.
- ⑨ 關於此一問題之全面性討論，可參看..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p. 5-10.

- ⑩ 關於這一點，參考..遠山茂樹，戰後的歷史學與歷史意識（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八，一九七九），頁七—一三。

- ⑪ 參考..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自序」，頁九一—一三..此議，「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發刊辭》，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頁一—一四。

- ⑫ 以上有關戰後歐美史學之一般討論，參看..Geoffrey Barraclough, *op. cit.*, pp. 45-93；李弘祺，「從社會

科學到社會整體歷史——現代西洋史學之危機(1)」，史學評論，第三期（民國七十年三月），頁三九—一八。

- (13) 見：G.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Methuen, 1967), p. 24.

(14) 張氏致張其昀先生函。見：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收入：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頁1。

(15) 卞潤孫，「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頁1—四九。

(16) 見：張玉法，「史學革命論」，收入：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八年），頁一五五。

(17) 參考：Tsuen-lsien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s",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II: 3 (May, 1954), pp. 305-327.

(18) 參考：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大陸雜誌第四卷第一期，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第一冊，史學通論（臺北：大陸雜誌社，無出版日期），頁101—111；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 見：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增訂再版），頁三三一—三八。

(20) 同上書，頁三五—三八。

## 八、從方法論立場看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② 同上書，頁三九一四三。

② 同上書，頁四四。

③ 參考：杜維運師，「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三期（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頁四一四一四五。

④ 見：劉師培，「左盦外集」，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影印本），頁二六七〇—二六八〇。

⑤ 見：何炳松，「歷史研究法」，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頁七三—七四。

⑥ 見：洪保德、崔亮譯，「論歷史家的責任(1)」，中德學報，第六卷第一、二期（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頁三二。

⑦ 史記（臺北：泰順書局影印新校標點本），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頁二二二三。

⑧ Putarch, John Dryden & Revised by A. H. Cloug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reprinted from the 1864 edition). 此書部份內容已譯成中文：吳奚真譯，希臘羅馬名人傳（臺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六三）。

⑨ 關於社會學的類型研究與史學關係，比較易得的中文作品可參考：拙譯，「歷史學與社會學：若干方法學上的考察」，及「社會學的類型研究與歷史解釋」，收入：史學方法論文選集，第十六篇；許倬雲師，「社會學與史學」，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第三及第四篇；許倬雲師，「作為社會科學的史學——行為與社會科學調查歷史小組之報告摘要——」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國六十年六月），頁一五五一五九；*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4).

- ◎ Ingram Byaketer tr., *Poetics*, 1452, in Richard Mcka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Lifetime Library), pp. 1464-1465. 中譯文見：姚一粦譯註，*詩學綱註*（新北：國立臺灣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八六。

- ◎ H.R. Trevor-Roper,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istory and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No. 42, (1969), pp. 3-17.

- ◎ Thomas C. Cochra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ynthe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4 (1954):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Edited in Fritz Ster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Meridian Books, 1956), pp. 348-359.

- ◎ Richard Hofstadter,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p. 359-370.

- ◎ 關於韋伯在中西歷史研究上之創見及其影響，筆者已別文介紹，此處不贅。參見拙著，*春秋戰國時代儒學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群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第一章；*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臺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六年），第一章。

- ◎ Shmuel N. Eisenstadt,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Civilization and Revolution". *Daedalus*, (Fall, 1977):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Vol. II, pp. 59-78, esp. p. 61. 本節所論為本埃氏之說，特此聲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關於埃氏本人之學說，筆者另有二文介紹，參看：拙作，「*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關於埃氏本人之學說，筆者另有二文介紹，參看：拙作，「*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

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收入：拙編，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年九月，增訂再版）。

⑯ 徐正光先生對於發展社會學會作詳細介紹。見氏著，「發展社會學——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對於發展問題的探討」，美國研究，第四卷第四期（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頁五—八五。

⑰ 參考：S.N. Eisenstadt, *op. cit.*, pp. 63-64.

⑱ S.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69).

⑲ 屬於世界體系理論，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系著文介紹，參看：Jia-you Shieh,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State, Social Force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 Critical Review of World System Theory". *American Studies*, Vol. X, No. 3 (September, 1980), pp. 69-97.

⑳ 參看：Marcel Granet, *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r.,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urice Freed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5). Freedman 評述的導語：“Marcel Granet, 1884-1940, Sociologist” | 文對葛蘭特所取益於徐爾幹者有詳細之分析。

㉑ 參照：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五一）。

㉒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㉓ 見：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九年臺再版），卷二，頁六七—六八。

㉔ 見：錢穆，史學導師（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三三一—三三四。